**狀態規劃**

提高語言地位的努力始於拒絕侮辱和傷害 - 無論是在不合理的限製或詆毀狀態 - 過去曾經訪問過它。這種限制和詆毀被認為不僅對語言的生存有害，而且對它所識別和識別的社區的生存也有害。阿伊努宣稱“我們不會......進入博物館”而白俄羅斯拒絕“壓迫[壓制]從幾乎所有生活領域中擠出來的東西。”如果英語可以感到遺憾的是，它自己的發言人“沒有更普遍的研究”這一事實，難怪瓜拉尼譴責“自己的孩子”那些忽視它的人“在教育學......知識分子......和科學領域“愛爾蘭人拒絕接受這樣一種錯誤的觀點，即”對語言的哀悼是多麼多愁善感（而不是任何實質內容）“，而韓國人則惋惜它”受到外語攻擊的事實。被中國人毆打......被日本人踩踏，用西方語言追逐土地。“毛利人拒絕繼續加入那些導致許多毛利人貶低他們的語言和文化的負面社會條件。遺產“和納瓦霍人[1]承諾抵制悲慘的情況導致“不到一半的用餐”[納瓦霍人的名字]兒童今年秋天進入幼兒園......正在成為Dine'語言的發言者。“挪威尼諾斯克[3]感歎其”書面語言“被壓抑，被誣衊為錯誤或貶低......瞧不起...... [和]沒有機會使用[它]的人“斯瓦希里語拒絕其作為”低級語言，低於聲望的地位“歐洲統治者的英語，是我們思想和他的語言的外國統治者的僕人。

對於主要功能性侮辱的無休止的合唱，一些來自共同種族的來源，另一些來自“其他種族”來源。許多投訴的一個基本特徵是被拒絕的暗示，即所愛的語言不是（或不可能成為）現代追求和現狀的合適工具。然而，這不是一個智力上或情感上不復雜的問題，因為所愛的語言的許多感知美德都與農村和傳統的真實相關。韓國人[1]認識到其問題的一部分是“整個國家正在向城市工業社會轉變”，正如挪威尼諾斯克[1]同意“農民屬於成為語言的拯救者的榮譽”一樣。正如斯瓦希里語承認的那樣，“唯一的庇護所......它仍然是真正的非洲人，是我們傳統使用的母語。”因此，前現代過去的獨特性與語言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雖然後者伴隨著世界各地更加統一的“現代生活方式”，但它已經發展並成為其追隨者所追求的現代舞台的動力潛力。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幾乎總是在現代性的方向上得到解決，但是前現代民族文化真實性的主張很少被完全擱置，他們回歸到尋求與語料庫規劃選擇相關的一些應有的滿足感，正是因為“傳統上有色”的現代性仍然是現代主義者和傳統主義者的對立目標之間可行和頻繁的折衷解決方案。

 對現代性狀態的驅動從一般和特定來源獲得了動力。不僅是匿名的，沒有人情味的“整體世界”，它無理地影響了所愛的語言及其奉獻者和捍衛者群體的合法權利，但歷史上的競爭對手和反對者更加嚴重地這樣做。正如白俄羅斯人認為自己特別受到俄羅斯和波蘭人的壓迫和誹謗，英國人用英國英語，荷蘭人在比利時用法語，弗里斯蘭人用荷蘭語，愛爾蘭語（和威爾士語）用英語，挪威尼諾斯克語用Dano-Norwegian（Bokmål），所以瓜拉尼抱怨“[西班牙語征服者的語言”，“豪薩拒絕”作為我們官方語言的外語[英語]，“索馬里反對”外國的書面語言殖民者和他們的走狗，“信德反對強加烏爾都語和沃洛夫，就像海地人反對法國人一樣。此外，在提升心愛的語言所需的狀態時，也會提到各種經典方言（即使這些狀態是完全現代的而不是經典的）。阿姆哈拉語[1]哀嘆那些“只想在...... Ge'ez中寫作的學者”並敦促他們“放棄教會的這種古老語言”，正如歐洲人所做的那樣，與他們各自宗教經典，以促進他們的個人vernaculars。十六世紀的英語在英國）認為“拉丁語在被學者們用於精緻目的之前也是粗俗的”，而十六世紀的法國人已經將其文學創作與希臘和拉丁經典作品相提並論，經典作家自己用他們自己的vernaculars而不是用他們自己以外的其他文化語言寫作。同樣地，泰盧固語[1]徹底宣稱自己是“vernaculars中最好的”，因為對梵語的忠誠，中國人為與古典普通話的聯繫感到自豪。因此，這種民族文化心愛的語言對現代地位的驅動（儘管現代地位充分穿著真實的當地傳統色彩）得到了各方面的強化，來自受傷的驕傲和相對於鄰國外國人語言的踐踏權利，以及對殖民者語言的怨恨從遠處，與世界歷史的比較，以及與當地相關的古典傳統的相似性或競爭。

 對於所愛之語的地位期望的另一個共同特徵是他們在道德義務和自然權利方面的假設。這種語言不僅應該得到保護和培養，而且這樣做也是一種責任，即涉及到明確的道德要求。我們之前審查的神聖性維度使語言擁護者能夠在絕對和不可減少的價值觀方面提出上訴。正是因為心愛的語言與其他真理如此密切相關，所以道德上必須相信並直接捍衛它們，並且顯然也適用於它。因此，愛爾蘭被認為是“神聖的國家信託”，其增強是“國家義務”。“重新定義”魁北克被視為“對我們的省份的愛，對我們的歷史虔誠”。希伯來文[1]承認一種義務來自於這種語言“忠實地為猶太人服務”，因此它現在應該適當地服務。同樣，Kaqchikel 援引孝順作為其對當代人的主張的基礎，而Manyjilyjarra 呼籲尊重祖先，以“使其成倍增加”並保持“傾聽，感興趣，相信”語言的重要性。烏茲別克斯坦專注於“肩負著歷史責任和義務”，意第緒宣稱“我們......必須......只要我們活著就要努力維持它”，因為“[在他們痛苦的死亡之前，我們在他們最近的哀嚎聲中向依地居發出瞭如此近乎親愛的殉道者。“很明顯，對於許多人而言，這種語言被視為一種道德實體，呼喚所有正義和負責任的人的幫助。 。在一個道德世界中，公正和真實的東西不僅必須得到維護和加強，而且必須清楚地看到它必須得到培養，傳播和捍衛，以抵抗所有貶低它或否認它應有的人。

 由民族文化奉獻相互滲透的語言地位願望值得我們在這裡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注。為所愛的語言爭取一種有尊嚴的生活的鬥爭往往是一場鬥爭，不僅僅是隱喻和防禦性的，而是在字面上和身體上都表達出來。塞爾維亞語談到使用“戰爭中的語言來解放知識分子和政治意識”，魁北克的法語回憶說“我們的父親為了生命而奮鬥，並且......他們的生活經常為他們的選擇付出代價......保持天主教和法語......保護他們的語言，書面和口頭，“不管這樣做的成本如何。烏茲別克斯坦呼籲忠實於前共產主義世紀的傳統，“為了我們的語言的發展而大膽奮鬥”，儘管有“入侵者的火焰”，信德決心“克服一切障礙。”顯然，地位變化對於心愛的語言而言，這通常是一種衝突的族際事務，往往是跨族鬥爭的更大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代世界中，自尊語言也是在物質狀態，獎勵和追求領域實施的語言 - 特別是在工作場所或市場，政府辦公室和運營以及識字機構和過程中。我們的物種並不是因為與不幸的鄰居自由和樂意地分享這種伴奏和權力表達而臭名昭著，後者不能完全歸咎於拒絕被動地接受從屬的唯一被指責的人。當後現代化或後期自治的蠕蟲最終轉變時，它必然會擾亂那些早先獲得特權和認可的人的和平與安寧。但是在它自己的眼中，蠕蟲的轉變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姍姍來遲的，實際上，僅僅遵循周圍世界各國和各國人民建立的例子，當然包括那些最大聲反對的例子。對於遲到者的“不文明”，但他們並不關心糾正早期現代化者自己所犯下的不公正現象。

**語料庫規劃**

正如一個人無法從母豬的耳朵裡掏出一個絲綢錢包，所以不能為所愛的語言釋放（或有時甚至追求）現代的權力狀態而不提供外部的外衣（命名法，標準化的拼寫，語法，現代追求和現代製度所要求的風格習俗。雖然在現代化的語料庫規劃之前完全支持種族首選語言的完善，但不可避免地發現，已經完善的語言需要人為乾預才能更完美，尤其是對於迄今為止尚未經常使用的功能。相關。這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不僅因為許多那些在機會看起來很渺茫時保留了心愛的語言的人在語言創新方面也很可能是保守派，而且因為這些創新必須經常在出版物，正式學校教育以及政治（甚至官方）活動已經狂熱起來。一個人從哪裡開始，如果有必要從舊船上建造新船，而後者已經在公海上並且機組人員對於航行的可取性並不是全神貫注的話？與狀態規劃一樣，人們通過拒絕批評者和反對者的冷笑假設來開始語料庫規劃，母豬的耳朵是母豬的耳朵，並且無法改變或改善它。

中國人發誓要最終拋棄“人物...... [具有許多[西方語言]固有的缺點”）並且懲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經濟的發展”和文化“和美國的英語懇求它不被認為是”庸俗的方言......只能用於貶低“，英國英語的游擊者的”偏見“也是如此。芬蘭人意識到它“繁瑣而貧窮”，因為長期統治這個國家的親瑞典精英“延遲和阻礙了種植”。豪薩確信其局限性可以克服，早期現代化西方語言的前限制，即通過“權威使用”。柏柏爾宣稱其方言多樣性也是“機會和豐富” [與其未來的現代化有關]，而不是缺陷。“Papiamentu 可能只是”西班牙的一種方言“，但即使如此，它仍然可以”仍然有一個榮譽的地方“等其他方言（加泰羅尼亞語） ，Gallego，阿斯圖里亞斯，甚至卡斯蒂利亞本身）！此外，儘管語料庫規劃涉及根據專業語言專業知識進行培養和標準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不能也不必丟失所愛語言的真實性。蒂格里尼亞勸告說，“我們必須沿著自己的道路前進，而不是”扭曲它並使其看起來像我們所學的外語。“傳統的根源和形式可以在詞彙和語法上發揮作用，保持種族偏好的語言不偏離其真實性質，即使它大聲拒絕不能實現現代化的指控。

心愛的語言的美麗和豐富是沒有同伴的，它們完全值得那些關注其現代化的人所需要的注意力（以及激勵）。南非荷蘭語是“最甜美，最溫柔”的舌頭，孟加拉語被比喻為“一種優雅的美麗......一種奇妙的美......一種共鳴，深刻和崇高的交響樂。”波蘭語是與“懸掛在巴比倫河上的豎琴，表達詩人的悲傷，嫉妒和希望”相比，泰盧固語[3]“在最文盲的嘴唇上聽起來也很和諧。它恰好被稱為東方意大利人。“但美學只是美麗中最明顯和膚淺的一面。純潔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的美，一種在過去的歲月中保持的美，也應該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得到培養。因此，現代土耳其語只有在多餘的Perso-Arabic元素被清除時才會產生”，斯瓦希里語警告“外國腐敗”只能將其轉化為“混蛋”。德語頌揚“為德國人民的純潔而鬥爭”是“為德國人民的團結和精神而戰”。最後，闡述也是一個公認的資產（也許是所有資產中最廣泛宣稱的），這是種族首選語言總是具有最有說服力和最必要的詞語，在對比的語言中奇怪地缺少詞語。瓜拉尼確信“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可以與我們的語言相媲美......歐洲語言無法超越......自然財富優越”，最重要的是“優於西班牙語。”正是因為心愛的語言基本上是非常優秀，如果為了現代化的目的需要語料庫規劃，它不必擔心或感到沮喪。如果做得恰當，其影響力只會是所有極為豐富和微妙的東西的集約化和示範。

 語料庫計劃經常以極大的可能性進行，以完善完美並使崇高系統化。雖然法國發現自己“能夠對待所有藝術和所有科學”（在1635年！）但它仍然懇求只有寫作可以傳授的最終財富。相比之下，大致那段時間的英語必須感到安慰，“學會的同胞”的“勤奮勞動”對於“豐富...... [其他]方言”是必要的，因此英語也將受益，“如果我們學到的話同胞們...... [奉獻]他們的勞動“。所以豪薩今天指出，英語曾經需要“多年的寫作和通過藉詞來豐富”，托克皮辛很高興“極易適應”和“容忍改變。”語料庫的直接焦點當然，計劃是書面語言（因此也是最接近並且通常僅僅是書面或印刷文本的發聲的正式口語）。將語言用於書面使用本身就是另一個例子，如果確實還需要另一個例子，那就是狀態規劃和語料庫規劃的完全互聯性。對於在學校和政府中使用的語言（狀態規劃），它需要書寫系統，拼寫系統，學術和政府通信的命名和風格，簡而言之，詞典，語法和風格手冊（所有語料庫規劃） ）。所有上述內容也是同時進行民族文化灌輸和解釋的語料庫規劃目標和副產品。日本人斷言其劇本充分反映了日本意識中如此突出的獨特性和孤立主題。烏茲別克斯坦宣稱需要“收回我們古老的文化遺產......阿拉伯文字。”腳本不僅僅是書面交流的工具;他們是珍貴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符號和法令。然而，傳統的腳本也必須經常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妥協於現代化的要求，甚至包括在某些“特殊的”基於拉丁語的腳本之前提出的要求。在我們的日子裡，由於國際標準化鍵盤和計算機系統的壓力，德語和西班牙語都丟掉了一些剩餘的“深奧”字母（從英語的角度來看是深奧的）。同樣，Basque字體和Hibernian字體（用於愛爾蘭語）已基本停用，Fraktur（德語）已經停止使用，因為它們需要增加編碼和解碼成本，相對於種族無標記的字體，在某些情況下，因為與他們有關的令人討厭的政治色彩。

 對於後期現代化的語言來說，利用與西方現代主流相關的劇本和版面的壓力更大，因為這些語言本身仍然需要獲得書面函數，此外，它們通常要求識字率太小相關的客戶能夠提供種族“真實的”非西方文字的額外奢侈品。當索馬里採用以拉丁語為基礎的劇本（通過其古老的阿拉伯競爭對手）時，索馬里稱其為“我們歷史上難以忘懷的一天”。我們的語言是要寫的。“隨著足夠的時間和足夠的不受威脅的獨立，一次”新“和”進口“的書寫系統也可能最終成為本土化和歷史驗證的。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土耳其人將重返Perso-Arabic文字，並且它在過去60多年中引入的特殊變音符號已經成為20世紀20年代採用的拉丁文字體，這有助於“ “大部分演講界都是土耳其語，而不是外國人。無法預測土耳其是否會有足夠的壓力誘使它在將來放棄這些變音符號。另一方面，如果蘇聯允許他們的俘虜國家採用與他們自己的西里爾文字有關的土耳其戰略，而不是強制統一的俄羅斯 - 西里爾文系統（例如，不僅僅是摩爾多瓦語） ，韃靼人，卡爾米克人，維吾爾族等，但即使是烏克蘭語和白俄羅斯語，今天可能會有更少的努力回到更加“真實地”前共產主義的東西（即外表上的非俄語）。除非有大量的毀滅，否則精英們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使一個被迫“違背其意志”的書寫系統本身化，而不是適應和本土化一個與歷史上的敵人，敵人和壓迫者較少認同的書寫系統。

**總結和結論**

幾乎語言的每個方面都充滿了種族意義和聯想。雖然對於連續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歐洲浪漫依附於該大陸每個角落的vernaculars的直接繼承人來說尤其如此，但這種繼承現在已經傳播到後帝國的地球周圍並且同樣激動（雖然，有時候，功能上不那麼獨特）激情幾乎無處不在，而且顯然是持久的。掃盲運動，現代化進程，基督教化，民主化，國家形成，文化自治運動，都為自己的目的利用和培養了語言和種族聯繫。雖然法語也繼續傳播（特別是英語，但也有一些區域性更加受限制的語言），因此，當地有價值的，公認的和受保護的民族 - vernaculars的持續增加並未導致種族間或國際交流的普遍崩潰，大多數有意識的語言和種族聯繫的持久性使得人類不斷增長的部分的未來必然是多語言的。甚至在各種英語母語國家中以土生土長的英語發音者也可能會認識到，在他們的情況下，語言和種族之間也存在聯繫。他們將來可能不得不為他們之前認為理所當然的許多語言優勢而奮鬥，例如在世界各地用英語撰寫論文。甚至超級大國都學會了在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贏得朋友和影響人們的必要性，他們可能會發現很久以前發現的迷你力量，即人們只能用任何一種語言，包括英語。因此，我預測，未來英語母語使用者也會更多地將英語作為他們自己種族的標誌，而不是作為全球性的智力和復雜的試金石測試。民族化和去民族化都在不斷發展;對於“富人”（他們經常將自己的特徵與“一般”[即，明顯的後種族]現代文明，其法語和英語都是他們的母語人士）混淆在一起，在某種程度上抵制了由於他們自己的種族和非種族色彩的原因而被“沒有”採用的部分。目前（1994年夏天），我們似乎正處於語言和種族意識的複興以及這種意識所培養的形象和情感之中。目前語言和種族聯繫的顯著突出可能會或可能不會持續到二十一世紀，但我們可以放心的一件事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聯繫本身將無限期地繼續下去。